

空海《文镜秘府论》编写动机新探

吴 双

提 要 海外汉籍《文镜秘府论》过去一直被认为是一部文学批评理论专著,尤其因为它保存了国内许多今已散佚的文献而备受关注。但它也是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第一部由外国人编写的汉语诗文写作教材。那么日本人空海为什么要编写《文镜秘府论》呢?笔者认为其编写动机与空海的家世、经历、日本社会对汉语诗文写作教材的强烈需求、为了适应宗教传播的需要而必须重视汉语书面语的表达有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 空海 《文镜秘府论》 编写动机

迄今为止,人们一直认为日本人空海的《文镜秘府论》是一部文学批评理论专著,这是因为它保存了中国久佚的中唐以前的论述声韵及诗文做法和理论的大量文献。但我们根据空海写作此书的宗旨以及全书的结构安排和重点所在,认为它其实是一部以汉语写作教材,而且是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第一部由外国人为外国人编写的汉语诗文写作教材。它在编排体例、教学原则及提供的大量范文上都体现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特色:1、呈现出完整而有特色的第二语言教学体系;2、尤其重视语音教学;3、注重对语言基础知识的教学;4、注重对语篇写作技能的教学;5、注重改错;6、关注学习者的写作过程。

我们从《文镜秘府论》的书名就能窥察到空海的良苦用心。“文”即作文,“镜”字揭示出该书的教材性质,即为了讲解写作规范,教导学习者摹仿范例并进而学会写作而编撰;而“秘府”两字,即告知书中珍藏着作文的种种奥妙。空海在《序》中还明确论述了他是应学习者的请求而编写该书的“虽然志笃禅默,不屑此事。爰有一多后生,扣闲寂于文囿,撞词华乎诗圃;音响难默,披卷函杖,即阅诸家格式等,勘彼同异。”^①“一多后生”即热心写作、恳请大师撰述的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日本学习者。空海在《南卷·集论》中还明确表示其编写目的是为了“将来秀士,无致深惑”,“足以比景先贤,轨仪来秀矣”,进一步证明了该书的教材性质。

《文镜秘府论》在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内藤湖南认为“弘法大师……当时看了很多通行的诗文法则书。于是他想到把这些法则汇集起来写成一本书,以帮助大家,为俗

^① 本文所引《文镜秘府论》皆用王利器校注《文镜秘府论校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人、僧侣写作诗文提供方便。”^①渡边照宏进一步说“平安初期,日本人盲目地写了中国古诗。他们写诗也不晓得规律。空海一定是为教日本人写诗而编著了《文镜秘府论》。该书到江户时代,作家们,包括儒家的人,一直用来学习写诗的课本。”“空海编著的《文镜秘府论》及其缩编版《文筆眼心鈔》到江户时代,数百年来一直作为作家们常备在身边的书。”^②崎冈洋右云“在平安朝(794—1192),知识分子写诗时参考《文镜秘府论》,作为一种指南。”^③等等,日本人关于类似的表述还有很多。总之,《文镜秘府论》自产生之日起,直到明治、大正时代(1868—1926)一直是日本学习者用来学习写作汉语诗文的入门书。而且它还是日本汉诗学的第一部著作,奠定了日本汉诗学的基础,在悉曇学、和歌学、修辞学等方面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这本汉语诗文写作教材出自空海之手,很可能与其家世有关。空海俗姓佐伯(一作佐伯真),母亲为阿刀氏,而阿刀氏族是汉人王仁之后裔。据传阿刀氏族是首次携《论语》等汉籍赴日教皇太子读书的汉人王仁之后裔,族内代出硕学,不乏鸿儒。阿刀大足则官至侍讲,专为伊予亲王讲读儒典。空海聪颖嗜学的天赋,与其家世、庭训不无关系。^④

那么,王仁是谁呢?西晋时期,汉字经由百济传入日本,《日本书纪》卷十记载:

(应神)十五年秋八月壬戌朔丁卯百济王遣阿直岐贡良马两匹……阿直岐亦能读经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师焉。于是天皇问阿直岐曰:“如胜汝博士亦有耶?”对曰:“有王仁者,是秀也。”时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别、巫别于百济,乃征王仁也。十六年春,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故所谓王仁者,是书首者之始祖也。

可见王仁是第一位赴日从事汉语教学工作的中国教师。据《日本书纪》卷十记载:“故所谓王仁者,是书首者之始祖也。”这说明王仁还是将汉字传入日本的第一人。^⑤

无疑,空海有在日本从事汉语教学的家传影响,他自幼就学习汉语。“据《高野大师御广传》说,空海12岁时,身为伊豫亲王学士的外舅知其喜为佛门弟子,归省时便教育他,‘纵成佛弟子,不如哲学文章’,于是‘依彼教先读《论语》、《孝经》等’。”^⑥日本真济记《空海僧都传》记载,空海十五岁时,即桓武天皇延历七年(788)到京师奈良入大学明经科;十八岁时著《聋警指归》,以申学道之志;年二十四时,即延历十六年(797),著《三教指归》三卷以阐释儒释道思想,发表他对教化济世之看法。可见,入唐前他对于汉学、佛学已有一定的造诣。

延历二十三年(804),空海乘坐的包括遣唐使在内的航船被海风刮到福建。该地区行政长官对日本遣唐使的由来毫不知情,遂将人、船扣押。空海代替大使草书陈情报告,

① [日]内藤湖南著,储元熹、卞铁坚译《日本文化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9页。

② [日]渡边照宏《日本の思想最澄・空海集》,筑摩書房1969年版,第8、20页。

③ [日]崎冈洋右《三国古典の散歩》,文艺社2007年版。

④ 高文汉、李秀英《论日僧空海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文史哲》,1999年第2期。

⑤ 关于汉字之传入日本,有很多种说法,这里采取的是王仁说。

⑥ 卢盛江《空海与文镜秘府论》,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其文笔深获福建长官的赏识,终于被批准顺利进入长安。空海到长安后,805年进谒佛教真言宗第七代宗主惠果高僧,惠果授其法名遍照金刚,并传法器予空海,空海成为真言宗第八代宗主。不久惠果入寂,当时周边不乏众多文笔优异的中国人,而空海被公推为惠果碑文的撰写人。可见入唐后,空海的汉语书面表达水平也令中国人折服,难怪朱千乘赠诗谓之“文学冠儒宗”者呢。“空海对中国诗赋文章已有相当修养,他是那样倾心于诗赋辞藻之事。”^①在空海的论著中,随处可见参阅的典籍非常多,还插入了大量的中国典故,用事贴切,运用自如,极具思辨力。可见空海的确不仅下功夫苦学过汉语写作,而且表现出高深的汉学修养,这为他后来编撰《文镜秘府论》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在空海身上还体现出浓厚的教育家色彩。在空海之前,日本只有贵族子弟学校,平民百姓难以受到教育。空海在唐留学期间,看到私塾、乡学等民间教育机构相当普及,因此得以人才辈出,即有回国民间办学的志愿。日本天长五年(828),空海创办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所平民学校——综艺种智院,除教授儒释道三家经典外,还教授阴阳、法律、工艺、医学、音乐等。其中,汉学文化和技艺当是其主要教学科目。

从空海的家世传说以及个人经历中,我们可以窥见空海头脑中存在着浓厚的汉语教学意识,空海所处的平安时代,是日本历史上中国热达到顶峰的时代。在空海身上,无处不被打上中国文化的烙印。因此,笔者认为,空海早在入唐前就有要编撰这本写作教材的意识,因而入唐后多方搜集资料,回国后,终于写成这部作品。从空海编写此书的宗旨来看,这是一部日本人为日本人编写的汉语写作教材,这个性质是确定无疑的。

三

公元6世纪至9世纪,即中国隋、唐时期,日本是大和时代后期、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前期。日本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国文化,仿照中国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使日本从一个杂有氏族残余、不成熟的奴隶制国家,过渡到制度完备的封建制国家。自公元607年派遣遣隋使开始,日本出现了全面移植汉文化的高潮,并一改过去对中国文化的摄取须经由朝鲜半岛中转的途径,对中国文化的引进吸收形式由间接变为直接。唐代,日本派出到中国学习汉文化的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来华十九次,空海就是804年随第十七次遣唐使团留学长安的学问僧。留唐日本留学生、学问僧总是尽其最大可能遍访名家书籍,搜购、抄写和复制中国文籍,然后运回日本。输入的汉籍在日本得到了广泛传播,日本人要研究、应用和借鉴这些汉籍,就必须刻苦学习,熟练掌握汉语书面语,而摹仿来自中国的诗歌进行汉诗创作,成为当时日本人习得汉语书面语的基本途径。

古代日本虽有自身的语言,但当时却没有自己的文字,据《隋书·东夷传·倭国》记载:倭国“无文字,惟以刻木、结绳为手段,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另一种说法是,王仁是第一位把汉字带到日本的中国人。不管哪种说法,都证明日本最古老的文字就是汉字,于是日本人口语使用本国语言,书写时则借用汉字来记录、传达和交流一切书面语信息,直至19世纪明治维新,一千多年内日本人民是以汉字作为自己表达意思、记载语言、交流思想、创造文明的通用工具的。这说明当时的日本人不仅是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外来文化,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把自己融入到对方文化之中,或者说把对方文

^① 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第5页。

化完全融入到自己的文化之中。”^①汉文学成为日本占主要地位的文学也就是自然的了。汉语能力比一般人更加出色的遣唐使们“勤奋努力工作的态度也在不断刺激着日本国内对学习汉文,提高汉诗文修养的热潮,使八世纪成了更加务实地实施律令制的时代”。^②

当时日本全社会在中华文化的影响下普遍形成了“济世”“经邦”思想。在公元七世纪初圣行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中,儒家思想被奉为日本君、臣、百姓一切行为的准则。“大化改新”之后儒家思想被贯彻于政治。《文镜秘府论》的宗旨可能带有一定的政教实用目的,空海在《文镜秘府论》的序文中即强调文章有“济世”“经邦”之功效。

与风格优美、抒情的和歌相比,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可以兴观群怨,风格雄浑、刚健的汉诗更适合“言志”,表达济世经邦的时代思想。传入日本的中国六朝和初唐诗歌备受日本人喜爱,于是日本上层社会掀起了学习写作汉诗的热潮,“嵯峨天皇自身十分喜爱汉诗,并身体力行地亲自吟诗作词,其优雅的文笔与空海及空海一同留学的伙伴橘逸势并列称为‘三笔’之一。”^③汉诗在日本的创作逐渐成为当时最为通行的文学形式,是具有汉文学教养的文人学士交往的一种自觉而有效的选择。此后也从未断绝。据日本《汉诗文书目録》记载,日本汉诗从其发轫的奈良时代至汉诗衰替的明治时代,先后问世的汉诗总集、别集达769种,2339册,收入诗歌在20万首以上——这一数字是非常惊人的!

那么,当时日本是怎样为满足社会需求而开展汉语书面语教学的呢?首先是以儒家经典为日本各级学校的教科书。日本飞鸟、奈良、平安时代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基本照搬唐制,在京城设立大学寮,以招收上层贵族子弟;在地方设立“国”学,一“国”一学(国:相当于唐的州级行政区划),以培养地方人才。日本还仿照唐朝的科举制度设置了“登庸试”,以秀才、明经、进士、明法四科考试,为中央和地方选拔人才,以考儒家典籍为主。合格者才能授予相应的阶位,汉文不合格者不能成秀才。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经典主要以诗文作为基本语言表达形式,而学习者要想获取汉诗诗文写作的技巧,仅靠解经是不够的,还须学习专门的写作技巧。而《文镜秘府论》客观上正为日本人学习和写作汉诗文提供了随身卷子。所以空海编写汉语诗文写作教材便是为了满足和适应当时的社会需求。

四

佛教在6世纪初期从中国传入日本,此后的日本佛教各宗都是从中国传入的。在尊儒的同时,佛教和政治及神道相结合,形成镇护国家的“国家佛教”和维护封建体制的意识形态。据日本学者上桓外宪一在《日本文化交流小史》中提到,653年,被派遣到大唐有241人,其中被记录下名字的17人中有僧侣15人,而且在那份名单中发现了日本中臣镰足的11岁长子定惠法师的名字,可见当时日本统治者不遗余力引进中国佛教的热情。此后,从中国传入由最澄创立的天台法华宗和空海创立的日本真言宗倍受朝廷重视,形成有本土特色的“平安佛教”,带有极浓厚的忠君爱国思想。当时佛门弟子对卷帙浩繁的经典

① 卢盛江《空海的思想意识与〈文镜秘府论〉》,《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

② [日]上桓外宪一著,王宣琪译《日本文化交流小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页。

③ [日]上桓外宪一著,王宣琪译《日本文化交流小史》,第103页。

的研习与苦修,已经成为顺应时代发展、谋求日本社会“今生来世”而精进不止的行为。

那么,“空海耗费了毕生精力要传授的真言密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教义呢?其实就是所谓秘密的真言,即通过咒文来显露各式各样的超强能力,归根结底就是带有一种咒术的法事经典。它以极端的象征性仪式,演绎出无比庄严的气氛,使各种参加仪式的人们对其抱以无尚崇敬的心情。”^①

语言和真理有什么关系呢?空海在其代表作《声字实相义》中说“如来说法,必籍文字,文字所在,六尘其体。文字之起,本之六尘。……此六尘各有文字。”又曰“一切国土所有尘,一一尘中佛皆入。”在空海眼里,“文字所在,六尘其体”。^②他认为佛教的隆兴须要依靠“声字分明”才能让“实相”之真理显现,极其重视文字反映实相、替代实相的作用。不论在家修行抑或出家,都万万离不开文章。

因此,密教的“密”,不妨可理解成“显”之极致也!语言在密教中居于何等重要的位置啊!只有声字变得分明,世界的真实之相才会昭然毕现。正如小西甚一在其《文镜秘府论考·研究篇上》序所言,空海的“密”,乃是法之外并无语言存在之道理,因此称为“密”。语言为法曼荼罗,常被人们视而不见,实际上它却将宇宙的真理大大地显现。

空海的密教作为一种思想在日本迅速传播,一方面作为镇护国家的教义与朝廷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得以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它将深奥的宗教思想转换成耳朵可听、肉眼可见的汉诗乃至美术等艺术表现形式传递给普通民众,具有培养人的想象力的功能,体现出杰出的思想性。由《文镜秘府论》中音韵、对偶占据诸多篇幅这一事实,令人慨叹空海对文学语言的高度重视!考察空海的真言宗语言观,我们发现空海的汉语教学及文艺思想与其宗教思想是密切相关的。在密教世界之中,语言就是佛法本身的表现方式,佛法本身是作为语言来表现的。因此,收入《文镜秘府论》的四声、八种韵、十七势、十四例、六义、十体、八阶、二十九种对、三十种病等等,在密教看来全部都是陶冶真言的规矩准绳。

既然佛教的真理须作为文字来显示,文字便成为教化的根源,而教化是第一义的,故文章就是建立国家社会秩序的第一义,因此,以“一多后生”为代表的佛门弟子为了提高自己表达“真言”的水平,请求老师空海编写这部汉语教材,实乃名正言顺之事。可见,空海正是应“一多后生”的请求,为了使“将来秀士,无致深感”而编写该教材的。

综上所述,空海的真言宗教义,与时政导向、社会需求紧密结合,形成了一套独具匠心的思想体系,并通过《文镜秘府论》作为教材所开展的汉语教学,直接帮助了日本学习者获得阅读中国典籍、写作汉语诗文的技巧,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说它是一部由日本人编写的指导日本人写作汉语诗文的教材,比说它是一部文学批评方面的书籍,更符合实际。

(作者通讯地址:吴双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 100083)

(责任编辑 晓文)

① [日]上桓外宪一著,王宣琪译《日本文化交流小史》,第99页。

② 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第259页。